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年

[英] G·巴勒克拉夫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1.14
206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年

〔英〕G·巴勒克拉夫编著

曾稣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029971

G. BARRACLOUGH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9—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4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 年

〔英〕G·巴勒克拉夫著

曾稣黎译

云汀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584,000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700 册

书号：3188·65 定价：4.7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托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至1977年，共出书四十六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引用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档案材料以及许多有代表性的专著，可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大专院校历史、国际政治等系的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这套丛书的战时编十一卷，自1978年起由我社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并为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单独作为一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发行。为加强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继续翻译出版《国际事务概览》战后编。战后编共十二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编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主要编写人有

1113/07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唐纳德·瓦特等。战后编各卷综述的国际事务比较全面，对错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有些问题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敌视和攻击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凡此种种，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对个别地方，翻译时已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如引用本书，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序 言

在本卷《概览》中，我们按照去年先例，将不同部分和地区分别委托给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成员们分别执笔。我们特别感谢 C·E·卡林顿教授，他为本卷所回顾的时期内显得十分突出的非洲大陆事务作了出色的论述。国际关系的渐趋复杂以及所涉及到的独立国家和民族数目的不断增多，使得由一人执笔论述这个过去的理想方法已成为非现实的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设法通过协商和其他方式，使本卷《概览》在题材和处理方面具有某种统一性。如同以前一样，由下面署名者对本卷全书负责。

G·巴勒克拉夫

1962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通向首脑会议的漫长道路 J. S. H. 梅杰	16
日内瓦外长会议.....	37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互访.....	52
从戴维营到首脑会议.....	66
U-2 事件和首脑会议.....	81
第三章 西方联盟 G. 沃纳	94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06
共同市场,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洲经济 合作组织.....	176
第四章 共产党世界 J. S. H. 梅杰	223
苏共二十一大以后的苏联对外经济政策.....	236
东欧国家.....	246
中国.....	253
中苏关系.....	256
第五章 亚洲和远东 R. F. 沃尔	269

第一节 中亚和印度次大陆.....	275
西藏	275
印度的对外关系	284
印度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311
巴基斯坦	323
锡兰和马尔代夫群岛	337
第二节 东南亚.....	342
缅甸	343
马来亚	346
新加坡	348
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	350
印度尼西亚	351
泰国	360
柬埔寨	363
越南	366
老挝	371
第三节 东亚和太平洋.....	386
日本	386
菲律宾、台湾和朝鲜	407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	413
第六章 阿拉伯世界：中东和北非.....	429
中东..... J·S·H·梅杰	429
马格里布..... G·沃纳	452
第七章 非洲年	C·E·卡林顿 474
第一节 法属、西属和意属非洲.....	481
法属非洲	481

毛里塔尼亚和西属非洲	491
喀麦隆	496
索马里地区	508
第二节 刚果	510
权力移交	514
独立、兵变和分离	525
联合国和刚果危机	534
政府的瓦解	550
杀害卢蒙巴及其后果	557
经济方面的影响	561
第三节 英属非洲	563
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	570
东非	581
尼日利亚	585
第四节 泛非主义	587
第八章 拉丁美洲	G·沃纳 597
第九章 过渡时期	657
首脑会议失败后的东西方关系：禁止核试 验会议和裁军会议	666
美国政策在阴影中	687
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1960年9—10月)	707
经济趋势	726
索引	H·R·马利特 737

地图

东经84°以东图	288
喜马拉雅山地区示意图	292
东经84°以西图	300
中缅边界	344
东南亚	373
非洲	475

第一章

导言

要在下文所述及的时期内，选出一些能提供某种范例或与历史密切有关的主要线索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在前些年，情况却有所不同。1955年，令人注目的是：亚洲中立国家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更多的自信心，形成了潘查希拉原则，并在万隆会议上体现出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宣布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竞赛和竞赛共处。1957年事态的发展，从较广泛的范畴说来，可以看作是前一年秋天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余波，这一年也可以看作是两个主要的大国集团集中全力各自进行内部调整的一年。1958年，国际关系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于1957年秋天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巨大技术成就所决定的。到了1959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到了从1959年初一直继续到1960年5月巴黎首脑会议流产为止的整个时期，形势就远不是那么明朗了。诚然，当代人即令有所怀疑，但也不大会怀疑形势的重点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即在新闻报道、时事述评以及无线电广播中连续出现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缓和，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之间的首脑会议在年内的进展，是终将达成实际裁军措施的前景。然而，人们有理由怀疑对这一年的重要意义所作的这种估价是否正确。从表面上看来，为在大国之间探求新的妥协的种种尝试，把这个时期贯穿

起来了；这些尝试是明显的线索，并因此在后面的论述中都占据优先地位。^① 但未来的历史家似乎不可能象当代人一样重视这些尝试，或者说，这些尝试在未来的历史家的论述中不会象本书后面的论述中占据那样突出的位置。未来的历史家很可能将他的视线从外交和大国往来的表面现象移开去，这些现象在他看来，大部分是无聊的，而且是没有效果的重复。他将会转向别的方面去探求这个时期的真正重大意义——也就是，转向非洲，那里由加纳于1957年获得独立以及法属热带非洲于1958年发生变化^② 所激起的解放潮流，正聚集着不可阻挡的势头；也可能转向亚洲，那里中国正在重新宣告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作用。诚然，不是1959年，而是1960年才是“非洲年”，虽然1960年发生的变化，在前一年里已被预见到，但却是大部分被低估了。^③ 诚然，中国只是刚刚从巩固内部并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顶点的经济发展阶段中迈出来，^④ 它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新角色所蕴含的意义还远未明确。然而，以上这些，连同在1960年对那个强加于人的门罗主义提出的挑战，以及对那个没有明说的认为整个美洲大陆和沿海岛屿都是美国私有“后院”的理论提出的挑战^⑤——很可能被未来的历史家们看作是1959年的“世界历史”潮流，而东西方之间关于裁军、缓和以及首脑会议的交涉，则十之八九将表现为一把大伞，在此大伞遮掩下发生着世界均衡局势更具根本性的变化。

无疑，1959年初，流行的情绪是比195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

① 下文，第二章，原著第12—70页。

② 参阅《概览，1956—1958年》(Survey, 1956—1958)，第287页，第454页。

③ 参阅下文，第七章，原著第367—462页。

④ 《概览，1956—1958年》，第541页以后。

⑤ 下文，原著第541页。

甚至比1947年战时同盟公开破裂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乐观些。鉴于1958年底柏林问题的再度爆发，^① 初看起来，这种乐观似乎很难解释。其实，赫鲁晓夫先生把柏林问题作为一个再不容无限期拖延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倒是当时形势的一个积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它保证能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召开一次自1955年以来他们一直回避的四大国首脑会议。这种似乎荒谬的论证或许更切合实际情况。根据“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想法（目前出现的核僵局似可证实这个想法），那就不难得出结论说——用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后来说的话^②——他们只能到“会议桌上”去“探求”他们所能取得的“最好的条件”。但乐观主义的最坚实基础——或者在当时人们看来似乎是这样——在于这样一个事实：1958年，美国、英国和苏联（但不包括法国），尽管是自愿而不是通过国际协议，终于都同意至少暂时停止热核试验。^③ 此种暂停试验或许可以成为永久性的，或者成为意见一致的裁军措施的序幕，并由此转而促成更好的国际气氛，这种信念与希望无疑是流行的乐观主义的主要根据。另一个根据是：中东局势渐次平静。中东是苏联和西方之间自从1955年巴格达条约签订以来互相争 3 夺的主要地区之一，现在中东的政治局势似乎又回到较正常的地区性勾心斗角的水平了。第三个根据是：美国在其空间计划和洲际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虽然远不能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尤其是1959年1月2日，苏联以“月球卫星 I 号”^④ (Lunik I) 著称的“宇宙火箭”“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

① 《概览，1956—1958年》，第574页以后。

② 上院辩论，第242卷，第1036栏。

③ 《概览，1956—1958年》，第562页。

④ 参阅《苏联新闻》(Soviet News)，1959年1月5日。

行星际飞行”——但一般认为，已足以使华盛顿能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而不致丢脸了。但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发生什么事件足以否定这一年开始时的那种乐观主义。相反地，米高扬在1月间私人访问美国得到成功，受到有礼貌的接待，而且他还提出保证：并不存在苏联为柏林发出最后通牒的问题。这件事是推向一个高潮的开端，在这个高潮中，2月底麦克米伦先生的访问莫斯科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而9月间赫鲁晓夫先生访问美国并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了著名的会谈，^① 则是这个高潮发展到了顶点。后来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不但似乎象征冷战之冰的融化，是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总结了在大多数人看来是1959年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然而，1959年的情绪之所以是乐观的，并不仅仅在于东西方缓和的可能性。首先，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似乎亚洲的政治情况一切都好。迄今为止，中印边界争端所包含的意义一般还没有被意识到；印度政府显然希望求得同中国和平解决，因此在1959年9月以前还没有发表中国的要求和入侵的详情，^② 从那时以后才逐渐明白：北京是认真的，不打算妥协的。在老挝，美国似乎不必花多大力气，也无严重困难，通过建立它的秘密机构而在取得进展；亲美右翼分子在1958年8月得手之后，似乎安稳地处于控制局势的地位。^③ 甚至在古巴，巴蒂斯塔的倒台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的上台，起初也被作为北美所谓的民主原则的胜利而受到欢呼——美国国务院里一开始便有几个人叫喊“共产党”，但在这个阶段并没有给人多大影响。^④

① 参阅下文，原著第19—20页，第42—44页。

② 参阅下文，原著第218页。

③ 《概览，1956—1958年》，第419页。

④ 下文，原著第473页，第474页注（即本书第609页注3——译者）。

——而且当卡斯特罗于1959年4月访问纽约时，他受到一次喧嚷的欢迎。^①此外，还有一种乐观见解从非洲非殖民化的进程中形成起来。人们广泛相信：这个进程最终必将使西方政策从殖民主义梦魇中摆脱出来，而加强了它同中立和不联盟国家打交道的力量。但构成西方乐观主义一切基础的主要根据则是：业已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1958年的经济衰退已被克服了。1959年人们评论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前景时，爱用最美好的词句，说六十年代将是物质进步和生产力扩展空前的十年。由此推出的结论，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人们自信西方无需害怕苏联提出的在和平竞赛中共处的挑战，自信西方的经济优势如此惊人，可以保证西方在竞赛中争取不发达世界的支持能得到成功。西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恢复的产物，经济恢复激起西欧民族新的自信心，因之它们不象以前那样情愿接受美国的监护——很可能是西方在1959年最明显意识到的问题，^②虽然十分清楚，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戴高乐的法国，愿意把这个问题推进到足以危及西方联盟的地步。此外，特别是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人们担心共产党在伊拉克的渗透，而阿尔及利亚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由此问题引起的对谁表示忠诚的问题意见分歧，继续制造着困难。但到了夏季中期，人们明白，对伊拉克的担心是被夸大的了，而长期拖拉的塞浦路斯流血事件得到解决又引起了在北非也能找到类似的解决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作出了巨大努力，来培植对于西方前

^① “暴风雨般的高潮”是在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参加的约有三万“兴高采烈的群众”，他们“唱着，欢呼着，叫喊着向这位革命领袖致敬”；《纽约时报》(N. Y. Times)，1959年4月25日。

^② 参阅下文，原著第132—149页。

途的乐观观点，来保证这个趋势不至于衰退。在这方面，华盛顿显然很重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于许多国家的一次广泛的友好访问。这次访问在12月结束，行程超过了二万二千英里，访问了欧、亚、非三大洲不下十一个国家，力图使美国给世界留下良好的形象。支持西方乐观主义的，还有共产党国家被经济困难所拖累的信念，以及中苏之间出现政治分歧的迹象。^① 苏联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垦荒地”计划失败（人们认为失败），北京承认1958年夸大了工业生产数字，并由此降低1959年指标，以及后来因干旱和饥荒而发生灾难，所有这一切都仿佛表明在经济方面是西方领先的。然而回顾以往，明显可见，在流行的乐观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不说隐藏着错误估计的话。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世界诸国，也许是一件做得很巧妙的对外关系的活动，他博得的喝采声在美国人听来也许是很悦耳的，但是这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政治力量的均势。总统回到美国时对听众说：从大西洋东海岸直到德里和卡拉奇，千百万人都怀着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友好而团结起来了——“他们现在是我们的热情朋友，如果他们在正确的精神下得到良好的援助，就将成为我们在自由中争取和平和友谊的坚定而强有力的伙伴”^②——其实，他所鼓吹的只是一种不费力气的乐观主义，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这种乐观主义极少有事实根据。

在1959年的乐观主义气氛背后，有两个明显的估计错误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低估了缓和的阻力的倾向；第二个因素是夸大了美国威望和政治潜力的倾向。关于第一个因素，当然总会有一些悲观主义者（或者象他们自称的“现实主义者”）振振有词地说：苏联对于缓和是不感兴趣的，它的裁军宣传的唯一目的不

^① 参阅下文，原著第195—196页。

^② 《美国文件》(U. S. Documents)，1959年，第69—72页。

过是在西方盟国之间打进一根楔子。在这些悲观主义者中间，西德总理也许是最雄辩和最固执的。但实际问题多少有些不同。问题在于，和平愿望和善意的表白，政治家之间的正式会谈，乃至议论得那么起劲的“戴维营精神”，是否能够改变这一事实，即以苏联为一方和以美国及其盟国为另一方，在裁军这一中心问题上所采取的无法谋求妥协解决的不同立场。至于次要的问题，如禁止核试验，则取得一定程度的和解是可能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也总有好战的一派出来反对，他们认为停止核试验将有害于国家安全，而裁军问题则又当别论。这里，一切病态恐惧立即发生作用，即是担心现有的军事均衡一旦被搞乱，就会发生什么恶果。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除了主张在一个特定的较短期限内达成全面、彻底裁军之外，就不愿考虑任何其他方案，并用深为猜忌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提出的带有更多限制性的措施的建议。苏联政府把这些建议视为一种花招，企图用来打破现有的均衡，使之不利于苏联。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认为目前要做的事情不可超出有限的监督和检查的建议范围之外，至于认真的裁军则推到以后的阶段去，并且只用含混不清的希望来表达。西方国家担心，苏联方面提出的广泛计划实行起来，如果俄国能够逃避监督，它们定将陷于无防御的境地。它们甚至也许担心，这正是苏联建议的目的。自然，事实是：现存的实 6
力均衡，对双方说来，都是以相互之间核威慑的现实为基础的，它所起的作用，令人十分满意，如果一旦被搞乱了，至少在政治家看来，其危险将大于必然是假想的利益。^①在一般公众中，那种互相毁灭的恐吓，尤其是那种因偶然事件——例如在柏林——而触发核战争的危险，继续使得舆论感到焦急不安。在一

^① 这个论点已由1961年1月20日《泰晤士报文学附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第33—34页上的无名氏作者相当有力地发挥了。